

重点推荐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诗歌历史和辉煌诗歌传统的国度。从古至今,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就是拥有了诗歌。因为有诗歌,我们有了探寻一切神秘事物和神圣事物的期待,我们有了同祖先对话和讲述伟大历史的能力。这种充满魅力的话语系统使我们能够准确地表达爱与愤怒、欢乐与痛苦。这正是我们的诗歌传统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内涵。

仰望中国诗歌两千多年的璀璨星空,李白和杜甫等众多诗人创造了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那个群星灿烂的诗之国度也为我们构建一个古老民族心灵世界的美学标高提供了真正的可能,同时奠定了中国诗歌在世界诗歌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一代又一代诗人高举着诗歌的火炬,照亮了历史的天空。传统就像一条河流,它有时汪洋恣肆,有时像涓涓细流,但它从未中断过,它是我们民族精神世界中的文化符号和链条,它是最初的源泉和我们的根。今天的诗人正是从祖先那里不断汲取滋养和力量,才有了创作的灵感和远方。在对传统敬仰的同时,我们更应肩负起承前启后的使命,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朽诗篇!

我是彝族人,彝族有一句谚语:诗歌就是语言中的盐巴。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作为“文学之母”的诗歌凝聚了一个民族最精粹的东西,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里,都能够找到诗歌的基因。相比于其他文学题材,诗歌更容易进入一个民族、一个人灵魂最柔润的那个部分,感受到彼此的良知、对自由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赞颂和渴望。

这些年,《中国诗词大会》《为你读诗》等节目越来越多,诗歌的回暖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说明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摆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在物质文明建设到达一定阶段时,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是任何一个健康、向上、理性的民族应该

让诗歌从童年启程

□吉狄马加

有的。但诗歌的繁荣不能靠表面的热闹,应该关注诗歌本身和诗人的成长,这样,民族的诗脉才能代代传承和延续。

童年是诗人的原乡,无论诗人走多远,他的诗歌里都有童年的影子。我出生在四川的大凉山,那是一个彝族聚居区。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盘桓于山巅、村寨,在瓦板房下、火塘旁嬉戏。节日里,看人们跳火绳、爬油杆、打陀螺、赛马、斗牛、摔跤、蹲斗、磨儿秋、藤秋、射箭……16岁时,我偶然得到了一本普希金的诗集,诗人那种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进入了我的心灵。

庆幸自己在少年时遇见了诗,让我可以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令人欣慰的是,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诗歌教育已进入菁菁校园,诗歌如春雨滋养着孩子们的心灵。而作为江苏四大“童”字系列品牌活动之一的“童心里的诗篇”少儿诗会经过十年的磨砺,已经成为全国少年儿童热切期盼和喜爱的儿童文化活动。尽管面临疫情,但参与人数不减反增,今年稿件数量达到了近16万份,振奋人心!

读着这些诗,纯真扑面而来,心灵仿佛受到了一次洗礼。在这些诗里,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正蹦跳着朝我跑来,那样熟悉和亲切!孩子们用诗歌赞美祖国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描绘家乡的变化和环境的改善,表达对自然的亲近和对真善美的向往。孙晓彤同学的《青藏线》看似写蜿蜒的青藏铁路,却表达了民族团结的大主题,读来清新自然:“我们一家/行走在青藏线上/爸爸说/青藏线就像天路/妈妈说/青藏线就像一条彩带/不对,不对/我说/青藏线就像祖国妈妈拉着儿女的手臂”。朱译辰同学的《绿》,让我们看到了农民的辛勤耕耘、医生的无畏逆行、教师的无私奉献……在小诗人眼中,绿既是春天的麦田,也是秀丽的青山;既是通行的健康码,也是朝气蓬勃的校

园;既是爱和友谊,也是自然的美好馈赠。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让我们见证了医务工作者的忘我。薛瑾蓉同学的《妈妈成了大白》写出了医务人员在防疫过程中忙碌的工作状态:“妈妈变成了大白/外表慈悲又可爱/身影虽然熟悉/我却很难才认出来/我喊她阿姨/她喊我宝贝乖乖/妈妈变成了大白/再没时间陪我发呆/枕边还留着香吻/却好难投入她的胸怀/偶然打通视频/她说宝贝,等我回来”。接着通过儿女对母亲的思念,反衬出母亲舍小家顾大家的情怀:“我不想妈妈变成大白/我想她就在家别再出外/天天把我高高抱起/笑着说我笨小孩”,最后,小作者笔锋一转,表达了对妈妈的理解以及对团圆的期盼:“可我知道妈妈是为我们杀毒除害/她把汗水泪水都藏进了大白/我等妈妈脱下了大白/我们一起唱出天籁”。从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亲人的默默付出,不由得令人心生敬意和感动!儿童是大自然的精灵,他们的想象力常常令人自叹不如。蒋思涵同学的《山路》这样写道:“小路一边往上走/一边扭着屁股/调皮的小路不知道/此时有人正跟在身后/模仿它/边走边扭”。短短几行字,一幅生动的儿童归来图便跃然纸上,那个扭来扭去的顽童形象随之呼之欲出。一遍遍翻阅孩子们的小诗,让我不禁释卷,一首首奇妙的童诗不时蹦出,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让人目不暇接。此刻,我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纵情歌唱天真烂漫的童年!

童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在最好的时光遇见诗,这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我羡慕今天的孩子,能够在诗歌的阳光下成长。诗歌给予他们的温暖和能量,将点亮他们一生的道路。让诗歌从童年启程,中国的诗歌大树才会根深叶茂;让诗歌从童年启程,我们一起奔向诗意的远方!

地坛、花园与精神镇静剂

——关于李德南的《为思想寻找词语》 □申霞艳

李德南对文学场的深度介入、对批评生态的讨论、对理想批评的执着,使其作为批评家的形象越来越清晰。李德南为人温和、谦虚、沉着,与时代喧嚣不同,德南身上散发着一股静气,这于以商业闻名的广州不啻为一剂镇静剂。当我心情混乱的时候,常常为身边有德南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高兴。他的性格既是天生的,也是文学阅读涵养而成的。在广州生活,房子是大问题。德南选择了顶楼,凭一己之力开辟了小小的楼顶花园,里面种了多种普通的花草,也间或种些瓜菜。我就吃过他精心培育的丝瓜,像鉴赏艺术品,含着敬重之心。德南有时会在朋友圈晒一下他的花,他亲手种植的茶花静静绽放,看着这些花,我总是想起花背后的主人。每朵花都承载着他的凝视、栽培和爱。他所种下的文字呢?也像这些花一样。栽种和写,咬文嚼字同样;栽花饮茶作为一种对待世界的方式,创作评论亦然。所谓知人论世,我愿意从花园展开想象,开始这篇小文章,也希望这篇小文能像小花一样开放。

史铁生是李德南的批评起点,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史铁生。大家都注意到德南的修养与众不同,他硕士修习哲学专业,对现象学、存在主义兴趣浓厚,读博开始研究现代文学,他找到了史铁生这个非常契合的研究对象。和很多作家为民族启蒙、获得职业、爱好文学、展示才华而写作不同,史铁生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自身的疑难,由于现实生活受限于整个创作具有从沉思升华为神思的气质。李德南的哲学储备正好为他打开进入史铁生精神世界的大门。从写作博士论文至今,李德南仍不断地回到史铁生,重读文本,常读常新。比如《我与地坛》,这篇标志性散文已有研究非常丰富了,李德南另辟蹊径,将史铁生写到过地坛的周边文本结合起来,结合作家的生命史来呈现地坛作为空间对史铁生的人生与写作所具有的起死回生的意义。《我与地坛》并不是一篇偶然到来的精品,而是经由漫长的彷徨和苦苦的挣扎后获得的生命结晶体。所以我们的阅读也不能一蹴而就,我们也需要在长夜痛哭过、在黑暗中攀爬过、与死亡对视过才能真正理解地坛,理解史铁生。记得曾有朋友于人生中途碰到巨大的困厄,几乎肝肠寸断,德南轻轻地劝慰道:去读读《我与地坛》吧。将阅读文学作品作为疗愈创痛、走出困境联系起来,这是德南切实的发现,也是他的生活观与批评观。地坛与史铁生互相成就,就像玫瑰园与瓦尔登湖、瓦尔登湖与梭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童年经验、生活历程以及心心念念的写作出发点。

契诃夫借《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罗夫医生道出心声:“森林能使土地变得美丽,能培养我们的美感,能够提高我们的灵魂。”从大处说,人类无不渴望“净化”,美化乃至神化。终生居住小镇的大哲学家康德暮年仍将心中的道德律令与头顶的灿烂星空并立。契诃夫忠爱玫瑰,惦记玫瑰园,在其中度过他的许多时光,他说:“大自然是一种良好的镇静剂。”阳光、雨露、四季、风霜,植物以不同的生命姿态应节,植物以自己的生命节奏给予人类教益,给人类关于生命限度的忠告。契诃夫的玫瑰花园、梭罗的瓦尔登湖、明清士子的园林、史铁生的地坛给我们留下不同的启示。作家、评论家都必须切实地感受生活,思入人生。

正是从植物生长的节律中德南慢慢形成了自己“和风细雨式”的批评观,他谈道:“如果一个批评家希望其思与言对所谈论的对象有所启发,与人为善的、和风细雨式的批评,其实比激烈的、不留情面的批评要更容易生效。而一个批评家的批评能够对作家本身有所启发,这样的批评,就可以说是建设性的。”在谈金理的学术批评时强调,“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批评,都应该与个人生命、时代相贯通,需回应生命与时代的问题……一种精神修炼或精神参悟的方式。精神修炼并不是只是获得信息或知识,而是包含着自我或内在生命的养成与建立。”读书、养花、写评论、看电影、喝咖啡、做策划……德南找到了生活通向心灵的通道。

李德南对城市文学尤其是深圳文学下了很深的功夫,他爱这土地,爱这充满活力的南方,他对邓一光、吴君、蔡东、王威廉、陈再见等当代作家的评论秉持鲁迅所说的“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让评论对象如沐春风,对批评性的意见亦易于接纳。他也关心崭新的传播方式对文学带来的影响,他关心电影、关心科幻文学由此展开对未来的眺望。他以一种具有预见性的未来维度来参与当下文学现场,通过参与策划栏目、约稿编辑以及评论、评奖等活动来深度介入文学生产。他发现当代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尤其是新书研讨会、新书分享会等方式让作家、评论家面对面沟通交流,真正的挑剔性的批评在这种面对大众的文学生活中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同时更重要的是,李德南认为评论家的人物不是为坏作品挑剔,而是应该将真正的“好苹果”彰显出来,同时对于同时代的作家也不应该过度吹毛求疵,而是予以理解和同情。他看重创作、评论生活对主体的心灵滋养,他渴望评论与创作一道为时代拓宽精神空间。

里尔克“与重大的事物交往”的文学抱负在前方召唤着我们。李德南以郑重之心塑造如沐春风的评论一派,他的沉着与执着给喧嚣的时代提供精神的镇静剂。

■三昧斋

很少有一本书,让人只想列出书中诸多作者的名字和文章标题,而不作任何评论。这不单是因为书中文章所承载的珍贵记忆与厚重历史,会让所有评论文字黯然失色,更是因为仅仅呈现这些作者的名字,便会令读者肃然起敬——

巴金、老舍、茅盾、艾青、冰心、柯仲平、艾芜、夏衍、唐因、萧乾、吴祖光、赵树理、沙汀、杨朔、徐迟、陈白尘、魏巍、刘白羽、宗璞、侯宝林、梅兰芳、萧军、端木蕻良、白雪、王蒙、冯骥才、陆文夫、林斤澜、汪曾祺、季羡林、苏叔阳、乐黛云、李瑛、玛拉沁夫、铁凝、扎西达娃、莫言、阿来、陈忠实、贾平凹……这些作者,只是《彩练当空——(文艺报)70周年精选文丛(作品卷)》(上、下卷)200多篇目中的一小部分。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文学艺术理论评论为鲜明特色的文化园地,《文艺报》无疑是文学艺术界的精神家园。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它和众多作家、艺术家、理论评论家们紧密携手,跟随时代的步伐,共同见证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

而一张报纸最唯美和深情的文字,总是在文学作品这片园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诸多大家名家,都在《文艺报》的作品园地留下了厚重的文字,包括散文、随笔、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等。这其中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名篇,更有大量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的精彩篇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创刊的《文艺报》,刊登的第一篇诗歌是郑振铎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铿锵有力的诗句喊出了全体中国人的心声。《冰河夜渡》(黄志、于永清)、《我们的铁骑队》(白艾)、《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巴金)、《浙东前线散记》(唐因),是当年深入现场的作家们对战争的真实描写,字里行间浸透着血与火的激情。

在新中国激情的岁月里,文学绝不仅仅只属于作家。音乐家、戏剧家、舞蹈家、演员、画家、相声演员,都写下了珍贵的文字。鲜有影像设备的年代,他们纷纷用生动的文字将珍贵的经历与读者分享。比如马思聪的《游苏联印象》、梅兰芳的《我在平壤的时候》、赵树理的《下乡杂忆》、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邵燕祥的《看苏联马戏》等等。艾芜的《美好的日子》和夏衍的《在欢乐的日子里》里都热烈抒发了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激动心情,常香玉在《永远记住这一天》记录了出席毛主席的招待会后心潮澎湃,动员大家集体捐献战斗机……

在那个文学的年代,文学家不仅记录日常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更关心着祖国建设的方方面面。几位作家合写的《参观东北归来》洋溢着对新中国工业事业的骄傲,李纳深入工厂写下了《工厂的女孩子们》,蓝子的《使人们得到幸福是最高道德标准——颂婚姻法》为婚姻法的改革鼓与呼。

那个年代,人们坦诚真切地反思自己的问题,改造自己的思想,思考文艺创作的方向。叶丹的《工人说我演得不像》、吴祖光的《生活给了我教育》、任天齐的《我走了弯路》、老舍的《提高质量》、冰心的《玉工的启发》、曹克英的《我是怎样学习写戏的》、李乔的《创作的源泉——生活,生活!》、杨朔的《把生命发挥得最有用》、徐迟的《人民的歌声多嘹亮》、新风霞的《我是戏包袱》等等,都在深入思考创作如何能更加贴近人民、贴近生活。他们的创作实践和心路历程,无比生动地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更多的时候,作家们真诚地谈论自己在创作中的困惑与收获,与评论家们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比如《孙犁、刘心武的通信》以多封来信的方式对文学创作进行深入探讨;冰心在《关于散文》里漫谈文学的时代任务;胡采在《给贾平凹同志的信》里,回应了贾平凹对三种创作和生活境界的提问;梁斌的《深入生活》回顾1942年反扫荡时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的创作觉醒;谌容在《痛苦中的抉择》中谈到自己文学创作的转折;秦牧在《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中反思创作最大的动力;王蒙的《我在寻找什么》探索文学真正追求的是什么;莫言在《桥洞里长出红萝卜》里讲述在修桥工地的做工经历如何影响了自己的创作;冯骥才的《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剖析文化背景如何影响创作与构思;铁凝在《还是要写人……》中思考文学作品究竟是如何打开心灵的大门;汪曾祺在认真分析《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曹文轩努力阐释《美比深刻更重要》……

除了对文艺创作和生活的思索,作品卷亦收录了诸多文艺界轶闻趣事和文友间深情追忆的文章,如艾青的《白石老人》、李零野的《忆在北京时的鲁迅先生》、侯宝林的《毛主席听我说相声》、李琦的《我画毛泽东》、何其芳的《悼念郑振铎先生》、刘白羽的《泥土气息与石油芳香——怀念季季》、巴金的《永远向他学习——悼念郭沫若同志》《悼念茅盾同志》、内山完造的《思念鲁迅先生》、魏巍《怀念小川》、姚雪垠的《三毛其人及其作品》、杨沫的《往事悠悠》、玛拉沁夫的《想念青春——文学回忆录片断》、陈忠实的《我的秦腔记忆》、乐黛云的《魂归朗润园》、萧耘的《父女谈话录——萧军说萧红》、苇岸的《去看食指》、陈建功的《在汪曾祺家里画画》、肖复兴的《投稿记》等等。这些篇章记录了文艺大家之间的友爱和真情,同时让读者领略到老一辈文艺家顽强奋斗、奉献一生的革命风采,以及新一代作家在岁月磨砺中的不断成长。对于当下中青年作家作品,选集亦有关注,意在呈现70年跨度的整体风貌。

这一篇篇大家名家的文章,不仅是精彩的文学作品,更是新中国70年文艺创作历程的真实记录,是中国现代作家艺术家们风雨兼程的文艺人生的深情再现。尤其在当下重读这些文字,不仅具有重要的人生启示,更是研究当代作家难得的珍贵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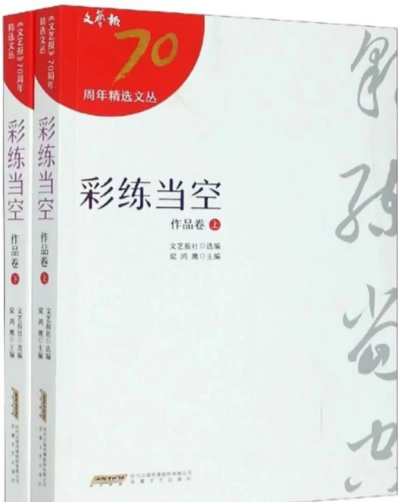
回想为了编选文丛,在文艺报社资料室里的几个月里,戴着口罩和手套翻看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当指尖一页页翻过泛黄的纸页,新中国文艺史上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部部经典的文艺篇章、一张张记录历史的图画和照片,如历史纪录片般扑面而来。信仰、人生、命运、激情……这些感怀的大词在脑中冲击回荡。正如几位刚入职的年轻同事所叹,这种历史的现场感和鲜活感是他们在学校研读当代文学史完全无法比拟的。

因此,这也不得不是一本遗憾之书,因为时间跨度如此之长,珍贵的文字数不胜数,尽管从最开始的计划编选40万字增加到了80万字,挑选出来的作品仍远远超出编选字数,而作品卷亦要考虑理论评论等卷的作家重复率问题,考虑到成书厚度,大部分篇目只能忍痛割爱、一减再减。而且此次编选也是《文艺报》首次跨越几十年时间进行编辑整理,时间紧、体量巨大,早期的繁体竖版在电子化过程中较难鉴别,肯定也不乏遗漏之处。只能说,这是一本不得不挂一漏万的文丛,70年的《文艺报》拥有的精神遗产远远不止这些篇目。自诞生之日起,《文艺报》就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关怀,得到文艺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这些文学财富是《文艺报》前辈们辛苦耕耘的成果,更是文艺界厚爱的历史见证。

早期的各种报刊,因为影像设备缺乏而大多以美术作品配图,《文艺报》更因近水楼台之故,刊登了大量著名画家的木刻、国画、油画、素描、速写、漫画、剪纸,比如报道演出的配图往往是画家们创作的舞蹈速写、素描,作家头像也常常以画家的素描或漫画代替。其中插图部分尤以精美的木刻作品为多,如黄永玉、古元、莫测等中外美术家的木刻。这些作品洋溢着质朴清新、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息。因为早年还收到过几位老画家的信件投稿,此次编选格外荣幸,翻看这些图画无疑成了编选期间的快乐之源,翻到精美插画就不断重复着“摘下手套——拿起手机拍照——戴上手套翻页——摘下手套拍照”的动作。而闲暇时翻看手机里的这些美术作品,无疑具有心灵治愈功效。遗憾的是,因篇幅所限只有少量插图入选。

面前这两本作品卷,没有华丽的封面、繁复的腰封、隆重的推荐语,简简单单的封面上只是《彩练当空(作品卷)》几个大字。哪怕它承载着如此珍贵的文字和图画,很大概率会被时代的嘈杂声音所淹没,但我依然真诚地希望它们能被看到。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光。这些杰出的文艺家们,是辛苦执着的持灯火者。愿这些火光,能映照到更多的人身上。



文艺巨匠的历史足音 光辉岁月的鲜活见证

《彩练当空——(文艺报)70周年精选文丛(作品卷)》编辑谈 □明江

百家品书

《半坡典故》：一部文化小说

半坡大队位于宁夏海原县境内,而海原则系以贫穷著称于世的“西海固”县份之一。小说叙述者先让老走出场,要说服你:贫穷不是全部,事情还有另一面。

老走,一个曾下放至半坡,后来以画当地风物人情而知名的画家,甚至至于说,倘若你瞧不起半坡人,眼里没他们,对不起,他们眼里也没有你。

夜郎自大吗?井底之蛙吗?非也。海原有另一面,也是半坡的另一面,让穷名盖住了。

历史上,半坡可绝非偏地僻壤,小说叙述者——一个历史学者,对当地主人由衷赞叹道,你们半坡“以前是大地方哩”。从秦汉至唐宋元明,其“周遭这片土地作为边地、关塞,在漫长的历史中曾为王朝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关隘相望,地名以城、关、营、堡、寨等命名者遍地皆是”(《来来》)。

历史厚重,眼界也不窄视,半坡人因此而有理由尊重他们的人,也有理由蔑视他们的人。

只是,半坡苍老了。然而,半坡又内蕴着顽强生命力。换个角度,他们的生活中,不只有“苦”和“可怜”。老走得说得好:“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快乐。‘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话说得正确啊,到了半坡我才真正理解了,而且有新的认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生活的真正主人。”

百姓日用而不知,有时则清楚得很。半坡人当然对历史感兴趣,也会为谁入了地图谁没入地图、谁被写进了书里谁没写进书里而吵吵嚷嚷一番,争得面红脖子粗,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怎么当回事。实实在在的生活,送往迎来,吃得好一点,穿得体面点,活得有尊严,自尊而敬人,这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半坡人说,“老天都不挡过光明人的路”,确乎是感慨系之的话。今天的生活,明天便成了典故、成了历史,半坡人比谁都懂得。否则,何来典故?

在画家的眼里,特别是一个历史学家眼中,有厚重历史背景的的人民和无比背景的人民不一样。叙述者,这个毕业于外国大学、有深厚造诣的历史学家,于整个文本中,其功能在于处处发现、平实讲述、不宣作倾向明晰的评价,尽管其钦敬之情不能自己地流溢于行间字里。叙述者受到了限制。请出画家老走,便是让他突破束缚,痛痛快快地替半坡人说话:“贫困,从来就不是半坡人的原罪,虽然它如影随形,摆脱不掉;而于贫困及灾难中一路走来、并未灭绝的半坡人,委实是一件值得品评的样本。”

半坡本身即是历史,但半坡人中没有产生出自己的历史学家。所以,半坡无历史。不是他们不想表述、不能书写,是不愿,或许还有不屑。那么,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季栋梁长篇《半坡典故》便成了半坡人第一部以文学形式写成的历史;它交代,它说话,却非翻案。

《半坡典故》是一部文化小说。它探触、索解了半坡的文化和实物,一个字、一个词语、一条谚语、一个句子,以及地下和地表存留的种种器物、陈迹,统而言之,每个东西后面都有一番说辞,都积淀着曾经的活人的行动。这让人想起股海光的一个定义:“凡有人的地方都一定有文化。完全没有文化的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中国文化的发展》)。

半坡,历史上系水草丰美之地,先后生活过多个民族,“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深度交汇融合之地”(《乌乎》),这不是《半坡典故》的新发现,也不是它要表现的内容。小说采用这个已为常识的结论,仅当作一顶帽子、一个引子。它的正是: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是在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碰撞、交错而产生出来的。独木难成林,未经交流、固守胶着的单一文化缺乏长久生命力。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多少明白了小说意涵和写法。它那么起劲地、目的明确地、兴致十足地考证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地名等等,只要证明一个论断:文化存在是为了人,而非人为文化而生死。人民是生活的主人,则文化就不该反客为主。或许还可以说,小说更为深切的一个主题,隐含于种种意趣丰茂的考证中:民众之间的交互动、往来联系,其开放、宽容、包容的品质,远远超乎了想象;即便免不了打打闹闹,牙齿咬了嘴唇,唇齿却是永远相依难割的。

文化原为消融偏见、歧视,艺术本为超越区隔、壁垒,读《半坡典故》,信然。《半坡典故》是一部文化小说,这仅是一种便宜说法。文化小说令人联想到思想小说。无论文化小说还是思想小说,以文化、思想为重,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人物等,退居其次。

《半坡典故》的文化内涵丰富,这是它给予人的第一印象。小说最终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它的故事、情节、人物。寺官与羊驼寺的“去疼片”给牲口看病起家成了名医,“收阴疗法”的老奶奶、鸽子客王舍、辘轳匠“干兄弟”二人等等,这一系列人物及其故事,是在一种文化氛围浓厚的叙事进程中,优游不迫、从容有度被讲述出来了。季栋梁本就是一个擅讲故事的小说家,他把文化与故事结合了起来。因而《半坡典故》这部长篇,与他以往所有的小说作品相比,呈现了别一幅面貌;置于当前国内小说作品中,也是一部不太一样的长篇。